

社会与经济

信任、权力与制度

[美]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著

王水雄
罗家德 译

SOCIETY
AND
Economy

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社会与经济

信任、权力与制度

[美] 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著
王水雄 罗家德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 / (美) 马克·格兰诺维特著; 罗家德, 王水雄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3

书名原文: Society and Economy: 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ISBN 978-7-5086-9164-0

I. ①社… II. ①马… ②罗… ③王… III. ①经济社会学—研究 IV. ①F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5847 号

SOCIETY AND ECONOMY: 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by Mark Granovetter

Copyright © 2017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

著者: [美] 马克·格兰诺维特

译者: 王水雄 罗家德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3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6802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号: ISBN 978-7-5086-9164-0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序 一

人们期盼已久的格兰诺维特积数十年思考的大作——《社会与经济》终于出版了。格兰诺维特早年的博士生，现在于清华大学任职的罗家德教授，是格兰诺维特的“忠粉”，他和王水雄夜以继日地把格兰诺维特的这本大作翻译成中文，即将在中国出版。家德嘱我为该书作序，我诚惶诚恐。我虽钟爱经济社会学，但就“社会与经济”这个大题目来说，颇感力不从心。所谓作序，也只能是从我的角度，谈谈对这本书的理解。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他是一位跨界的奇才，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界最具有经济头脑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界最注重非经济因素影响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家。他一生都在试图完成一项似乎难以完成的理论工作，

就是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人类行为动态复杂系统，使该系统既能解释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建构，也能解释集体和制度对个人选择的约束。

格兰诺维特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在全世界享有盛名。虽然他作品数量不多，但一出手就是经典之作。他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领域都很有影响，并多次获得引文桂冠奖。他提出的“弱关系”（weak ties）、“嵌入”（embeddedness）等学术概念，甚至成为引领学术流派的一个符号。几乎他的所有作品，包括《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等，都已译成中文并出版，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中国是一个注重“关系”的社会，在格兰诺维特理论中，最为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成果，就是他的“弱关系”理论。格兰诺维特发现并证明，在现代社会，亲朋好友之间交往频率高的“强关系”，在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交往频率低的“弱关系”帮助大。他对这个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解释，因为“强关系”传递的只是同质的信息，而“弱关系”才更可能传递有用的新信息。同样也是格兰诺维特“忠粉”的边燕杰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证明在中国还是“强关系”起的作用大，因为所谓“关系”，只是传递的渠道而已，有的可能传递的主要是信息，有的可

能更多传递的是权力、地位、金钱、人情的影响。

我早年就读过格兰诺维特的作品，并深受启发。我在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时，就借鉴了他关于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并把它和经济学中企业组织对市场具有替代作用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分析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对“羊城村”的研究中，《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是我重要的参考著作。格兰诺维特强调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嵌入在社会境况之中，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构成。这些论述激励我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寻找“经济生活的社会规则”。

在这本书中，格兰诺维特引述了大量的实证成果，不仅有他自己的成果，也穷尽了几乎所有的当代相关实证成果，用以论证他一生追求的宏大的命题，即“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格兰诺维特是那种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入手的大家，他“烹饪”出一桌无所不包的理论大餐，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精细、那么别致、那么有味道。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格兰诺维特多年研究的总结和升华，必定会成为传世之作和新经济社会学前行中的一座丰碑。

从社会学思想史上来看，格兰诺维特通常被认为是经验社会学的高手，他身上并没有那些理论社会学大家的光环，特别是在今天“一切都要证明”的美国社会学的氛围中，人

们通常认为，他与那些酷爱思想演绎、经验归纳稍逊的社会学理论大家不是一个套路。但恰恰又是他，颠覆了重大的理论问题。

由于我的知识范围有限，我只能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他的“颠覆”，或者说得婉转一些，谈谈他的贡献和创新。

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大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有一本名为“经济与社会”的巨著，他们都在书名中把“经济”放在“社会”前面，他们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是强调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影响，这在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似乎也一再被历史所佐证。但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的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如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把这种推论称为经济思想的“殖民”，即以市场逻辑支配和主导社会领域，把经济规则视为一切社会行动的标准。我觉得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新”：一方面他重提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嵌入”，要为经济学“找回”（bring back）社会，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新命题；另一方面他未停留在从理论上“找回”，而是通过扎实的可验证的实证研究来“找回”，这是以前的理论大家都未能做到的。

二是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正如一句调侃的话所说的那样，

在社会学家眼里，只有约束没有选择，而在经济学家眼里，只有选择没有约束。社会学的主流往往更加强调，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被制度、环境和观念体系所制约。经济学的主流则通常被认为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偏好和理性选择的决定作用。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Blau）、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经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都曾试图在制度和行为之间发展出一种具有分析力度的理论。在这条学术积累的脉络上，格兰诺维特别具匠心，在批判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理论倾向后，提出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在制度决定论和理性选择决定论之间找到了一个具有分析能力的理论框架，为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成功地架起了一座连接的桥梁。

三是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同时还非常罕见地授予了女性经济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以表彰他们在治理领域的卓越贡献。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交易成本的分析把企业的科层制组织治理和市场网络治理连接起来，找到经济治理模式选择的解释；而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在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之外，发现了第三种治理模式——自组织治理，解决了如何管理公共财产的问题。格兰诺维特则另辟蹊径，提出社会网络是第三种治

理模式,发展了威廉姆森“中间型组织”的论述。也正因为此,很多人认为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强有力的潜在竞争者。

四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从学科发展史来看,经济学与社会学一直经历着文人相轻的漠视、理论假定的纷争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大概是经济学家中最注重社会问题研究的,他对诸如犯罪、教育、家庭等问题的研究和观点都独树一帜,让人眼前一亮。但他用经济学理性选择法则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被格兰诺维特在这本《社会与经济》的开篇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立论的靶子。为应对这种“经济学的侵入”,格兰诺维特高举新经济社会学大旗,以社会学的原理,深入触及经济活动的“硬核”(hard core),如生产、分配、消费和信息网络等,类似一种“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的呐喊。但不管怎样,这种“对话”,不是学者的意气之争,而是有学派才有学术。

这本书应是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巨著的上册,我们期待着下册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以上杂谈,权作序。

李培林

2018年于北京

序 二

大师的淡定

2018年12月的一天，忙里偷闲的家德兄，到我办公室小叙。一落座，闲扯了几句时事，话题自然落到格兰诺维特教授的这部《社会与经济》大书上。

家德是教授的弟子，深得真传，这点在一年前他出版的著作《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家德并未就此止步，他将教授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理论，很自然地移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用“圈子”、“关系”来透彻解读强连接、弱连接，以及网络中的机会与社会资本，当然他最为关注的是“自组织”。

教授的新著《社会与经济》，据家德介绍，是一部打磨了十几年的著作，很多章节的内容，家德都事先读到过，特别

涉及东方文化的有关内容，教授都多次与家德仔细研讨。家德带来这部书（上卷）的打印稿，嘱我做一小序，虽力有不逮，然盛情难却，便应承下来。

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啃教授的这部大著，自然费力很多。更具有挑战的是，我对这部铺陈宏大、论梳细密的著作中所提到的诸多文献史料，并不完全了解。虽然蒙家德兄信任和鼓励，依然觉得难以做出更多有价值的评价。只能老老实实，放平心态，用一个“门外汉”的视角，对这部大著略谈几点读后感吧。

我读格兰诺维特教授的著作，一个机缘是2011年在北大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上一门“互联网前沿思想”的课程。课中有一个章节，介绍“社会网络”的理论。适时业界流行“社会计算”、“复杂网络”和“推荐算法”，格兰诺维特教授在《镶嵌：社会网络与经济行为》中的思想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将经济行为纳入社会网络来审视，在技术专家看来，是非常自然的。美国学者巴拉巴西1999年的“随机网络中标度的涌现”和瓦茨、斯托加茨1998年的“小世界网络的群体动力学”两篇著名论文，开启了互联网结构与动力机制研究的新疆域。应用专家有了理论依托，技术工程师有了研究方向和工具，产生了一大批成果。

教授的弱连接、强连接、镶嵌思想，也迅速被公式化、代码化，纳入各种分析模型，为网络结构分析、节点动力机制分析，提供着丰富的理论营养。但以我之陋见，这似乎并非格兰诺维特思想的全部。

格兰诺维特教授这部用力甚多的《社会与经济》，似乎意在“纠正”这种“埋头应用”的偏差。他试图让众人的目光，重新回到他数十年前提出的这个“元问题”上来。这个元问题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

承认“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似乎从直觉上并不难，难的是教授的这一论断，需要冲破既有范式的重重障碍，冲破业已固化成型的“经济学—社会学”关系的认知模式。这一认知模式渐渐被过去 200 年来的社会学、经济学的学者大师们用汗牛充栋的论著、阐释、演讲挤压成型，变成有关人性、组织、生产要素、生产关系、信任、权力、制度、文化，以及理性、道德、正义、财富、公平、分配等词语的“接插件”，用理论、流派、范式、模型，以及某某主义等封装好的“标签”，作为探究活生生现实问题的工具。

教授从“低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开始，不厌其烦地像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一样，用探铲、手镐、毛刷在岩石断层或者整齐的探方中，仔细辨认着结构功能学派、有限理性学派、文化决定论的主干和枝枝蔓蔓的支流——我心想，

真难为教授了啊！

以我这个门外汉的眼光看，教授之所以这么做——据家德介绍，他这部著作的下卷，是众多的案例和实证分析——是为了让自己在三四十年前的理论创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教授就像一位孤傲的绅士，宁愿一再延宕著作的出版，也要将穿缀而成的思想框架奠基在扎扎实实、经得起检验的文献疏证的基础上。

这是学术，是卡里斯玛（Charisma）。

“卡里斯玛”是教授多次引用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概念，从早期基督神学引入政治学、社会学，并首次在1922年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中，用来形容那种超凡脱俗的领袖气度，以及令人景仰的非凡魅力所形成的威权统治。这种卡里斯玛在文艺复兴以降的500年间一路下滑，伴随“理性精神”、“自由解放”的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异军突起，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文艺复兴之后，学术卡里斯玛所面对的圣像，发生了180°的转弯。从宗教意义的上帝，转移到“斯宾诺莎的上帝”。

但是，教授所面对的，却恰恰是这种“卡里斯玛”的精髓部分：诚如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坚称的，罗马的衰败并非基督教所致，而恰恰是对基督精神的背离。对超凡脱俗魅力的景仰和向往，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托勒密传

统中，热切追寻的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物至理，也是绵延上千年的中世纪炼金术士口中的至尊咒语和秘方。

“斯宾诺莎的上帝”，依然有“上帝”的余晖。

所以，教授需要用同样的耐心、同样的方法，暂时放下建构理论的冲动，克制宏大叙事的诱惑，逐一指认在他看来把理解世界的逻辑“弄拧了”的前人的工作。教授是认真负责的，也是富有卡里斯玛情怀的。

插一个不算八卦的话，家德兄跟我闲聊间，不经意谈及与教授同一时期的学者，甚至是合作的学者如威廉姆森、阿姆斯特朗都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云云，诸多同行纷纷议论说，教授是“离诺奖最近的人”。家德所转述的教授的淡定与洒脱，或许可以对这一绅士般的卡里斯玛情怀，做一点小小的脚注。

“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在我看来绝不是某种灵光一闪的观点，这是大智慧。尽管教授字里行间处处谦逊地回避各种建构范式的“嫌疑”，耐心地梳理数十年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思想演进，但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倒一个个儿”，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也需要游刃有余的功力。

从200年前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开始，社会学家就产生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参照系，就是将社会学理论弄得跟物理学理论一样漂亮、坚实。经济学在我看来也有这股子劲儿（甚至

更过分)。数量经济学就是如此，如果没法弄得特别靠近物理学，那就弄得特别像数学。

这股子劲儿，训练、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产生了一堆又一堆厚厚的文本，堆积成一座又一座山峰，就像炼钢炉旁边堆积的钢渣山一样，冷却下来后坚硬无比。教授面前的，就是这样的山峰。

经济学作为基础，就像一个插线板，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就像插头一样，奠基和依赖于经济学，这大致是旧的、宗教的卡里斯玛消退之后，普鲁士教育革命奠定的近现代大学范式中新的学术卡里斯玛。格兰诺维特教授和其他教授们都明白，这套卡里斯玛是用论文、数据、公式、影响因子说话的。

但是，互联网来了，情况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世界网民和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越了自然人口的一半，信息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新的生产要素，“斜杠青年”和自由职业者已经重新定义了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分法在信息经济面前已经了无新意，甚至这两个词语听上去都是“脏词儿”（携带着浓厚的工业文明的味道），新物种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旧的理论框架左支右拙，漏洞百出。

格兰诺维特教授关于“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的论断，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学术假设，而是一个事实，一个绕不开

的事实。

说实话，在拜读教授大作的同时，我多次掩卷长叹：除了向教授表达敬意，我私下里觉得教授其实可以更“洒脱”一点，用德鲁克畅论“21世纪的管理”、“后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快意文字，痛快淋漓地宣读一份对旧学术卡里斯玛的起诉书。教授其实可以撇开这么多厚厚的参考文献，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洞见和思想的言说，率性地做一次“没有参考文献的著述”。

当然，话说回来，教授所做的一切，其实也正是这个艰难旅程的一部分。顺便说一下，教授的弟子——家德兄，正是他思想精髓的拥趸，也是身体力行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家德几年前将教授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圈子”“关系”“韬略”“亲缘结构”结合在一起，用“自组织”、“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重新审视的时候，我从他兴奋的神情中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欣悦之情。也许教授想畅快表达的思想，弟子们已经在做了吧！

点滴杂感，不成文字，聊以为序。

段永朝

2019年元旦改定于北京

译者序

先谈一个有趣的现象，知道格兰诺维特的人一定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博学深思的理论家，他提出了“弱连带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理论和“嵌入理论”，在社会学引文中排名数一数二，对经济社会学的推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确实，受教于格兰诺维特教授五年半，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都是理论，但很奇怪的是，从他第一个学生伍迪·鲍威尔（Woody Powell）到和我同时在学的布莱恩·乌西（Brian Uzzi），以及之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加上我本人及很多师兄、师弟，却都在做大数据和动态系统模型，就好像我们的老师教的是方法、数理以及计算机一样。一个纯粹只教社会学理论的老师为什么会教出一群做数理模型的学生？

其实从这本书中就可以找到端倪。进一步说，这本书在